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
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
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王右君**

投稿日期：107年11月1日；通過日期：108年6月10日。

* 作者誠摯感謝兩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與悉心指正，使本文得以有今日的呈現。

** 王右君為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專任副教授，email: yowjiun@mail.nck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王右君（2019）。〈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
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新聞學研究》，141: 39-81。

DOI: 10.30386/MCR.201910_(141).0002

《摘要》

自傳式記憶經常藉由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述說或傳統自我敘事文類得以組織建構。做為社群網站，臉書上的社會互動和敘事空間，除開啟新的記憶銘刻和傳播模式，亦改變敘事者與互動他者的關係。本文的個案研究以親子記憶為例，探討不同他者如何涉入臉書個人敘事記憶的內涵，包括親近／重要他者、主體他者、誘話者、說話對象、想像閱聽人和實際閱聽人。

研究發現，臉書的場址特質和風行文化，令個案傾向以簡潔愉悅的敘事腳本記述親子生活。敘事的主要誘話者，乃希望紀錄珍貴記憶或調適生活處境的自我；而其記憶再現則隱現賴以建構自我的主體他者。臉書的回饋機制，令使用者得以即時感知閱聽人回應，強化其發文誘因；扮演協力誘話者之餘，閱聽人也可能身兼社會課責代理人，影響個案自我敘事的策略以及記憶篩選、組織的方式。較諸一般閱聽人，說話對象乃敘事特意傾訴者，其觀點和回應對記憶內涵的影響也較深。因他者凝視而生的自我審查，與自我凝視的程度相連。臉書的互動機制和其文化模式的可觀察性，令他者凝視得以持續與自我凝視交互運作，介入在此進行的連續性微型記憶敘事。

關鍵詞：自我敘事、自傳式記憶、社群網站、敘事記憶、想像閱聽人、數位記憶

壹、前言

記憶研究學者 José van Dijck (2007, pp. 1-2) 在引介「媒體中介記憶」(mediated memory) 的概念時，追溯西方世界以空鞋盒收藏照片、信件、日記、筆記、剪報甚至錄音帶、錄影帶等物件的慣習。van Dijck 認為，這些物件是世人對於過往人事物記憶的媒介，同時也中介了與之相連的人際、社會與社群關係；做為中介者，這類物件超越記憶儲存庫房的角色，形塑記憶構築的方式以及建立於記憶之上的個人身分和集體歷史。

在電腦中介傳播改變媒介生態的當下，數位記憶鞋盒開始遍布我們的日常空間。從早先的個人網頁、部落格、My Space 等，到現今幾乎全面攻佔社交生活的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 site) 如 Facebook (臉書)、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中介記憶的文字、圖片、影像和聲音，找到新的存放空間。與實體記憶鞋盒非常不同的是，這些虛擬鞋盒並非私藏於個人櫥櫃，而是有限度或完全公開展示於他人眼前。Hoskins (2018, p. 2) 指出，數位傳播的連結風潮 (connective turn) 之下，「分享」已然成為一種不自覺、幾近自我強制的行為。Garde-Hansen, Hoskins & Reading (2009) 認為，這些經由社群網站中介的數位記憶，基本上也以分享、互動為原則，而這種分享文化，正是數位記憶與傳統媒體中介記憶大相逕庭之處。

當然，與他人分享記憶，並非社群網站獨有。記憶建構的工作，經常在社會互動中的自我敘說中完成；舉凡在日常對話或各種場合中陳述經歷事蹟、與家人朋友閒聊過往、或促膝翻閱相簿追憶當年等皆是 (Fivush, Habermas, Waters & Zaman, 2011; Nelson, 2003; Wang,

2013)。社群網站中的記憶再現，一則運用書寫或影像符號，將記憶工作付諸於可保存形式，一則延續社會互動中的自我敘事，在社會交往中進行。然而，社群網站中的社會互動畢竟不同於面對面互動，其中一個顯著的差異是，同樣是與他人分享或在對話中共構記憶，面對面社會互動通常有著明確的談話對象（interlocutor），社群網站則不然。雖然社群網站可容許使用者建立交友圈和設定個別發文的觀看者，卻不盡可能掌握何人何時會看到發文，或者是否回應、何時回應等。發文者心中可能有所預期，甚至使用工具（例如臉書的標註朋友功能）召喚特定對象，但不見得必然奏效；同樣地，非預期中者，卻可能留言回應，召喚發文者進一步互動。

另一個重要差異是，社群網站中的社會互動經常以非同步傳播方式進行，個人動態貼文和其回應之間更常如此。這也意味著，個人在使用社群網站中的貼文分享敘事記憶時，往往在一個幾近獨白的情境下進行；相較於此，一般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述說，大抵在面對一位（或多位）誘發談話者的狀態下進行。雖然，獨白式敘事記憶早體現於日記、手札、回憶錄和自傳等傳統紙本自我敘事文類，不過，這類自我敘說雖涉及準社會互動（para social interaction），但非如社群網站般，建立於社會交往和人際互動的基礎之上。傳統自我敘事文類的出版或露出，多以單次完整形式展現；Smith & Watson（2010, p. 187）以 Twitter 為例指出，社群網站的自我敘事令使用者得以近似連續性傳播方式，表述其人所在位址、活動和心境，可待再觀察的是，使用者能否藉以串連成「日常生活的微型紀錄」（microrecords of everyday life）。

簡言之，社群網站的個人檔案提供一種殊異的記憶建構和分享空間：個人以微型生活敘事，與不確定、想像中的他者對話、互動，而此種敘事對話的持續發生、串連，則形成不斷延伸的自我記憶敘事連續體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continuum)。在此過程之中，對話／互動他者扮演顯要角色，而值得深究的是，此一角色，究竟與面對面社會互動和傳統記憶文類中者有何差異，而這些差異，如何影響社群網站自我敘事的生產以及藉此所進行的記憶建構？

晚近記憶研究指出他者參與個人記憶建構過程中的兩個主要層次：其一為實體社會互動中與個人對話者；其二為既存於社會之中、可能影響自我記憶腳本的他人；兩種層次可能疊合，例如，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經常是社會互動的對象，也可能影響了個人記憶述說的框架。自我敘事學者則認為，他者存在於文本之中，也存於之外：自我經驗的述說往往揉雜他人事蹟，而自我敘事做為可為人閱聽、接收之文本，則有其誘發者、對話者和想像或實際接收者。綜觀之，自我敘事和記憶建構有著不同的層次和面向，其中存有不同類別和作用的他者；倘若，社群網站在提供新的社會互動和記憶文本形式之際，亦改變他者在敘事記憶建構過程中的角色，那麼，我們如何從上述幾種層面向上看見改變的方式並探索其意涵？

循此，本文試以四個親子生活敘事記憶的臉書個案研究，做為探索此一問題的開端。選擇以臉書做為社群網站的案例，一方面是因其近用程度，另一方面是因其功能取向。就普及性而言，臉書目前仍居臺灣社群媒體用戶首位，截至 2019 年一月，每月活躍用戶約一千九百萬 (We Are Social & Hootsuite, January 30, 2019)。做為建構個人社會網絡的平臺，臉書可供註冊會員建立個人檔案頁面，以「加友」方式將其它使用者拉進自己的社交圈；用戶也可自成群組建立公開或私密的社團互動空間，或成立粉絲專頁。在訊息功能上，臉書可供用戶在個人動態中發佈文字、貼圖、分享照片、影片、網頁連結或打卡、標註朋友，甚至直播影音等，並可在發佈後編輯或刪除貼文；訊息可依隱私設定和朋友分類

決定可觀看對象，並依此管理他人留言、回覆、符號回應（按「讚」或其它心情圖示）等，並提供即時通訊工具供雙向或多向通訊、聊天功能。在諸多功能中，個人頁面上的動態時報是主要的敘事空間，以逆時（將最新發文置首）方式排列，概念延伸自既有的線上日記（如部落格網誌和交友網站個人日記）；雖然功能和使用文化上鼓勵輕薄短小，但實際單篇發文字數上限達六萬字（李宜穆，2011 年 12 月 1 日）。這種形式，有助使用者以文字、照片或影音隨手保存、再現個人生活中的片刻記憶，或回溯完整事件甚或某段生命時期，並在分享過程中進行社會互動。近年來臉書在系統中增加各種記憶提示功能，例如在「我的這一天」中顯示個人歷年當日的貼文，依照日期提醒用戶曾經發佈的貼文、或與人結為朋友的週年紀念，或個人臉書活動週年回顧等。

在使用傾向上，若干研究指出，臉書使用有助自我肯認和建立歸屬感，促使人們從中尋求情感支援、降低孤寂（例如 Bachrach, Kosinski, Graepel, Kohli, & Stillwell, 2012; Holtz, Smock, & Reyes-Gastelum, 2015; Lou, 2009; Mustafa, Short, & Fan, 2015; Nadkarni, A. & Hofmann, S. G. 2012; Toma, 2010; Yang & Brown, 2015），意味著人們仰賴臉書做為生命情感出口的可能性。選擇親子記憶做為敘事記憶的案例，固然有鑑於俗稱的「親子文」常見於臉書世界，但主要乃因養兒育女在個人生活的重大意義。在性別角色典範轉移、各式新興親職腳本充斥的今天，個人親子記憶的敘事腳本，也更可能出現與社會論述協商的可能。

本文中所涵蓋的四個個案包含了三位母親和一位父親的臉書活動，藉由理解他們運用臉書敘事建構親子記憶的模式及模式生成原因，探討在此敘事記憶場址中，自述文本內外的多重他者所扮演之角色和可能影響。本文所聚焦的他者包括：(1) 誘發敘說自我經驗的他者；(2) 敘事文本描述的他者；(3) 敘事者傾訴的對象；(4) 想像和實際接收敘事文本的他者；(5) 與敘事者進行互動的他者。為區辨敘事記憶中的他者，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本文將於文獻探討一節中，先後就自我記憶與自我概念的關係、社會互動和媒介敘事在記憶建構上的意義，以及社群網站敘事記憶中的多重他者等進行爬梳；接續說明本文之研究問題和多重個案研究方法。四個個案將逐一進行描述分析，並於結論一節綜合討論，就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意識進行回顧與反思。

貳、文獻探討：記憶、敘事與他者

一、自傳式記憶與自我概念

自傳式記憶因為涉及自我概念，與社會記憶、文化記憶和集體記憶並列為記憶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廣義而言，自傳式記憶指稱個人對於己身日常生活經驗及具體事實的長期記憶，當前學界在此面向上的研究，大抵承襲了 Bartlett (1932) 以降，視記憶為建構產物的觀點。當事件發生，人們通常試圖理解事件原由與意涵，事後所記住的，通常也非原封不動的事件重現，而是經過意義詮釋 (Ohta, 2006)。因而，記憶並非單純記錄或無暇反映過往，而是意識下的產物，在脈絡中排列組合、篩選增減或修飾改變 (Marles, 2015)，這些記憶的組織再現，是個人行動的過程和結果，同時也構成了自我概念。

為說明自傳式記憶與自我建構之間的關係，認知心理學者 Conway 及同儕就其中模式進行描摹，為本文的問題意識與案例分析提供理論基礎。在此記憶模型中，自傳式記憶被區分為情節式記憶 (episodic memory) 和語意記憶 (semantic memory)，後者為個人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前者則再現短暫時間切片中的活動經驗感知，乃建構自我記憶的核心元素。人們慣常以階段性目標或生活事件為圓心組織日常瑣碎、

零散情節式記憶，諸如開學、假期、聚會、購屋、上班等，皆可能成為集結記憶的綜合事件（general event）；這些以事件為單位所組織的記憶，堆疊出有關特定生命時期（lifetime period）的記憶，並且依循不同生命題旨（如情感關係、工作、親職等）分列入隊，共同構成個人的生命故事（life story）以及建立概念性自我（conceptual self）的基礎（Burt, Kemp & Conway, 2003; Conway & Williams, 2008）。

在諸多情節式記憶中，若干記憶因為再現具特殊目標指向或後續影響遠大的生命活動，對於自我概念和自我評價格外意義深遠；尤其，當記憶內容因關乎個人長久關切事物或無法調解的衝突，而特別活躍、歷歷在目、具有情感強度並且易與其它記憶鏈結時，更可能在定義自我上扮演重要的功能。這些賴以定義自我的記憶（self-defining memory）在生活緊張或目標衝突時經常能收安定之功，人們可藉由回溯這些關鍵記憶尋求洞見或前車之鑑，為當下行動提供指導方針；甚至，當情緒無法得到排解，過往美好或正面的記憶，常可被援引為調處現下心境的良方，修復負面記憶帶來的傷害（Conway & Williams, 2008）。

自我概念在記憶中發展，意味自我建構永無止盡、恆常更新，直至生命殞落。值得注意的是，記憶與自我並非單方向的施受關係。自傳式記憶建構了自我概念，而此一恆處動態中的自我，則是記憶工作的執行者，引導著自傳式記憶的製碼、再現、組織和提取的方向。研究發現，人們可能修改過去記憶以適應、連結當下的自我概念；當記憶中的自我與當下自我概念吻合時，人們的自我回憶可能顯得更清晰有力，反之則可能斷裂、扭曲；與自我相關的事件通常更易儲存於個人記憶之中，與自我無關或關係微小者則遺忘於時間長河（Wang & Conway, 2006）。精神分析學者 Tilmann Habermas（2012）指出，記憶修飾所涉及的改變，非僅止於個別記憶本身，尚且延伸至整體生命故事：人們在整合個人生命故事時，傾向維繫連貫、統合的自我並貼合社會文化意義，同時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在時間序列、因果動機和主題上求取一致性（coherence），在此前提下，記憶可能被加以重新再現、調和、排除、修飾，甚至扭曲，其組織和詮釋方式亦可能依此而異。

二、社會互動、媒介敘事與自我記憶

自傳式／自我記憶的研究論述，明確指出記憶的可建構性及記憶工作存在的必然性。建構記憶的工作大幅仰賴社會互動中的日常敘事完成，而人們在幼兒時期習得語言述說生活事物，便開始發展以言語敘事組織記憶的能力。這些初始能力在核心家庭中主要進展於幼兒與雙親（尤其是母親）的言談互動之中；在父母和孩童之間的日常對話裡，孩童便經常主動或被動地回溯每日生活細節或各式活動所為。在這些家庭內社會互動中，雙親通常扮演引導幼兒記憶述說者的角色，在互動過程中也可能進行回憶敘說，提供孩子說故事的參考框架，因而，幼兒在培養敘事記憶能力的同時，其述說回憶模式、記憶再現的框架，甚至記憶內容的擇選，皆可能受到雙親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力並非純屬個人性質；做為社會文化群體的一員，父母往往在無意中扮演了社會信念和文化慣習的中介傳承者，指引或暗示幼兒「可以述說」和「不可述說」的邊界、應該如何述說，以及如何理解所述之事物（Fivush et al, 2011; Nelson, 2003; Wang, 2013）。

據此觀點，社會背景、文化脈絡以及語言符號和敘事形式，影響自傳式記憶的建構模式與實質內涵，不論是經由照護者的潛移默化，抑或是直接接觸各式銘刻記憶的文化文本所致。Fivush 等人（2011）指出，社會中普遍流傳的經典傳記文本、生活腳本及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提供其成員組織及評價生命敘事的框架，而個人的自傳式記憶、敘事和身分認同，也在這些文化文類之中受到詮釋。這些觀察，暗示了個人記

憶和他人記憶、記憶銘刻和其物質載體之間所存在的羈絆。循此，van Dijck（2004）進一步深化記憶與媒介之間的關係。van Dijck 認為，個人的記憶是一種文化現象，經由言語慣習、社會文化實踐和科技工具的層層過濾而生，在傳播媒體高度貫穿社會生活的今日，傳播科技與媒體敘事對於個人乃至集體記憶的中介角色更甚以往；媒體科技和既有內容形式約限了記憶表徵的形構，使得經由媒體中介之記憶非僅單純紀錄過往，尚可依媒體性質生產特定記憶。隨著記憶中介、形構方式的改變，人們賴以調處自我與文化之間衝突矛盾的方式也可以因之而異。

數位傳播容許人們以同儕分享、參與式傳播方式紀錄、儲存、提取、轉移和流通記憶（Garde-Hansen, Hoskins, & Reading, 2009），人們也更傾向對外揭露個人記憶（Hoskins, 2016），並且在記憶分享、鏈結的過程中，進入公共／文化記憶的生產場域（Bartoletti, 2011）。Hoskins（2018）強調，記憶是人們在各式生活處境與他人、制度、媒介等各種社會文化生成物相遇和互動的結果，電腦中介傳播普及後，人們與人事物相遇、互動和建立連結的模式有了巨大的轉變，記憶建構的方式及其潛能和風險也為之丕變。

綜合以上，人們的自傳式／自我記憶經常仰賴社會互動中的言語述說進行建構，此一過程和結果，一則受到前行敘事記憶文本和社會文化框架的指引，另外也受到銘刻記憶的中介載體和誘發記憶敘事的社會互動模式所影響。在電腦中介傳播深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人們的社會互動大量透過數位傳播（尤其是社群媒體）中介，意味著數位媒體不但可能中介、承載影響個人敘事記憶框架的大敘事和文化腳本，亦是人們進行社會互動並從中生產個人甚至集體記憶的文化場址。根據 Garde-Hansen（2009）和 Hoskins（2016）等人的看法，相較於面對面或其它非網路中介的社會互動，社群網站雖增加個人記憶暴露於公眾面前的可能性，但技巧嫻熟的使用者通常知悉觀者存在的可能，其自我記憶再現或許因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之而異。此一觀察，也正符應本文研究題旨的出發點。

三、社群網站自我敘事中的多重他者

自我敘事學者 Paul John Eakin (2008, pp. 22-26) 認為，任何以口說、書寫或影像符號形式轉化個人生活經驗為故事的行動，皆為敘事認同系統中的一環；經由這些可大可小的敘事活動，人們構築出生命故事和以此為內涵的自我身分。Eakin (1999, pp. 86-87) 指出，這些自我故事經常建立在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上：所謂的自傳，與其說是個人故事，不如說是個人與他人生命交錯所共構的故事，尤其是某些關係親近的他者 (proximate other)；往往，個人生命的歷程和意義，須假借描述親近他者與自我之間的關係或共享生活，方才得以表彰。例如，子女經常是為人父母者自我故事中的親近他者，反之亦然。

另一種對於自我敘事內涵影響重大的他者，存於言語描述之外。Eakin (1999, pp. 62-63) 援用心理學者 John Shotter (1989) 的論述指出，自我述說看似自律自主，但敘事認同系統其實受到「社會課責」(social accountability) 的法則所規範。社會課責的概念在此可理解為「可以向社會提出說明」或者「可以給人們一個能夠理解或接受的說法」：浸淫於社會文化中的人們，在述說現實經驗時難免不自覺援引社會既有敘事模式做為依據，彷彿只有如此表述才能名正言順或為人理解接受；當敘事發生於人際互動之間，人們對於他人觀點的揣測和判斷，經常影響了述說自我的方式，因而，真正左右自我敘事的根源，在於他人之眼。這種傾向，早在人們習得語言與人交談時即開始發展。倘若記憶述說構成身分的內涵，那麼，人們往往從上述人際傳播的過程之中學習「成為」某種人。

Eakin 的論點吻合前述心理學界對於敘事記憶的論述，並進一步指出互動他者扮演社會課責的中介者和代理人角色的可能性。Smith & Watson (2010, pp. 86-88) 延續其論點，詳論自傳式敘事者 (autobiographical narrator) 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如何以顯著或隱晦的方式進入文本之中。兩人認為，自我敘事作者之於敘事文本，有著「進行敘事的我」(narrating “I”) 和「敘事中呈現的我」(narrated “I”) 之雙重身分，後者為前者選擇性地建構及披露於他人眼前的自我。這個選擇性再現的自我，其存有面貌經常透過與他人的關係或互動得表彰，包括「歷史他者」(historical others)、「隨遇他者」(contingent others) 和「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 等。歷史他者為集體歷史中的人物，可被援引為個人生命或認同典範者；隨遇他者依生命歷程之描述見諸文本，有其意義但較為淡薄。重要他者則有三種可能型態。第一種接近 Eakin 所說的親近他者，例如家人、伴侶、愛人、摯友等。第二種是「理想化但不在場的他者」(the idealized absent Other)，以隱晦的方式在文本中受到提及，例如古奧斯汀在《懺悔錄》中所對話的上帝。第三種為「主體他者」(the subject Other)，亦即，賴以建構自我主體性的他者，存於所有自我敘事主體內在之中：如拉岡 (Lacan, 1968) 所言，人們自嬰孩期的鏡像階段 (mirror stage) 起，便依賴外部他者的存在形貌來想像整合統一自我，據此，Smith & Watson 指出，每一個自我敘事者皆有一個主體賴以建構的外部他者，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一種概念。

除了區辨上述幾種文本內含的他者，Smith & Watson (2010, pp. 64-69, 88-90, 96-99) 延伸 Ken Plummer (1995) 區分「誘話者」(coaxer) 和消費者／閱聽人 (consumer／audience) 的概念，進一步區分出誘話者、說話對象 (addressee) 和消費者／閱聽人，指涉看似外在於文本、

但關乎自述文本生成的他者。誘話者乃誘發敘事言語行動者，可以是人、機構、制度或文化律令，可能影響敘事者所使用的訴說模式、話語內涵和風格；誘話者的身分依敘事場域和處境而異，可能顯而易見也可能隱晦存在；在某些敘事情境中（例如訪談），誘話者可能扮演協力發展敘事的角色。說話對象是敘事者所設定或想像的訴說對象，可能在敘事中明確指稱，也可能透過敘事間接指涉，一個敘事文本中可能含有多個或多類對話對象。消費者和閱聽人是實際接收文本的人，但不見得是預設說話對象，然而其人對於敘事的前行知識和預先期望，可能指引敘述話語的內容。綜合 Smith & Watson 有關自我敘事文本之誘發、閱聽及對話者的闡述以及 Eakin 對於社會課責的論述，我們得以推論：假想他人思維、觀點和評價，並順應假想而採取敘事行動，正是社會課責進入自我敘事的方式。

Eakin、Smith & Watson 發展上述理論時所援引的案例經常出自傳統自我敘事文類，其敘說的場址（site）與社群網站自有差異。Smith & Watson（2010, pp. 69-71）認為，敘說場址包含誘發和進行敘事的場合（occasion）和位址（location），對於敘事的內容、準則、依循規範和述說處境有著一定的框架和引導性質。這也意味著，做為自我敘說的場址，社群網站如臉書等，其固定常設的發佈貼文和回應模式，以及人們使用該網站發文互動的慣習和文化模式等特質，可能影響記憶敘事進行的過程與模式。針對晚近網路自我敘事的發展，Smith & Watson（2010, p. 247）提醒未來研究者關注網路互動中的交互主體性，尤其，他人的回應以及個人在文本中的編輯和修飾等作為，如何令此間自我敘事更傾向成為一個經由他者協力甚至集體生產的文本等問題，值得深思。

社群網站研究學者以「想像閱聽人」為旨，討論預期訊息接收者對於發文者行為表現的影響，有助思考前揭問題。想像閱聽人的概念源自

Walter Ong (1975) 對於讀者角色的闡述；Ong 認為，異於面對面的口語傳播情境，作家／書寫者往往須依其書寫主題和形式，虛構 (fictionalize) 文本的閱聽人，並且為他們設定某種角色，做為撰寫時的依據；在此過程中，前人的閱聽人設定模式經常成為參考對象。Marwick & boyd (2011) 指出，社群網站使用者在不確定其接收對象的情況下發文，經常需要想像自己的觀眾。與紙本出版或廣電傳播不同的是，社群網站的想像閱聽人常來自原本社交圈，並可經由雙向傳播加以揣想，藉以調整發文的策略和表現。Litt 則認為，社群網站的想像閱聽人可分兩大類：包含所有交往圈的抽象閱聽人 (abstract audience) 或是根據交往關係而定的目標閱聽人 (target audience)。其想像則受到巨觀及微觀層次交互作用的影響：巨觀層次為使用當下的社會科技環境，包括使用者之社會脈絡和角色所賦予的規範、使用者對於活躍閱聽人 (active audience) 的感知，以及傳播場址特質對於傳播行動的框架；微觀層次為使用者的個人背景特質，包括其傳播動機、社交和網路技巧等 (Litt, 2012; Litt & Hargittai, 2016)。

若干以想像閱聽人為名的社群網站研究延續 Marwick & boyd 的界說，分別從發文者的身分展演、形象控制、隱私揭露程度和範疇，或談論話題的自我審查 (self-censorship) 等面向，說明人們如何依循當下動機、目標，針對不同類別的想像閱聽人設定或調整發文策略和言行表現 (例如，Baym & boyd, 2012; Choi & Bazarova, 2015; van Dijck, 2013; Marwick & boyd, 2011; Papacharissi, 2012)。想像閱聽人與說話對象的概念皆源自傳統敘事文類，但概念和實質指涉對象上有細微差異。說話對象是敘事者傾訴的對象，可能被設定了某種接收位置 (例如同情或寬恕的聆聽者；Smith & Watson, 2010, p. 236)。想像閱聽人是假設中的文本接收者，其中可能包含了說話對象，但不盡然皆為敘事者特意傾吐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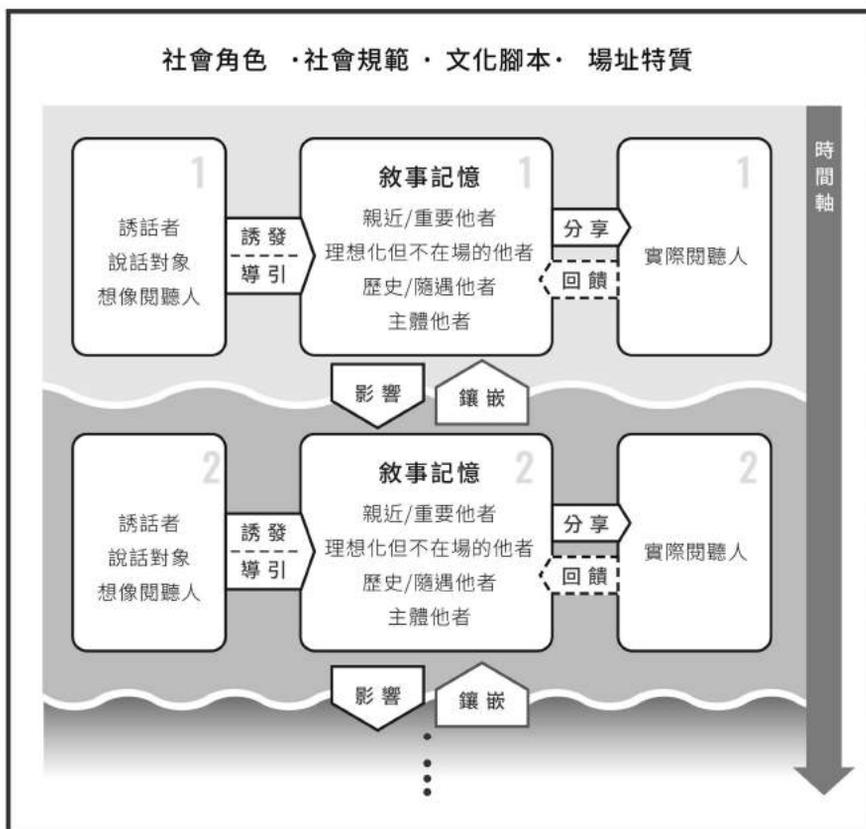
或預設聆聽位置的對象。

綜合以上，自傳式記憶賦予人們生命故事和自我概念的基礎，並且經常承載修復情感和調處生命課題的功能；捕捉生活片刻時光的情節式記憶為自傳式記憶的構成單元，依循生命階段和生活題旨受到組織、連結、再現和詮釋，亦可能因追求自我統合而受到修飾或改變。日常社會互動中的自我敘事乃建構自傳式記憶的重要途徑，其人社會角色、所在社會規範、文化腳本和敘說場址之特質，則構成敘事記憶的脈絡。做為一種記憶建構的路徑，自我敘事之內外，具有多重類別他者的存在和互動關係；當前社群網站在開啟新的社會互動空間之際，也促發新的記憶敘事場址以及分享回饋模式，在這種新的模式之中，最顯著的改變，是互動他者的存在方式和扮演角色。簡言之，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記憶的生產有其誘話者、說話對象和想像閱聽人，誘發並導引敘事的走向；敘事文本的內涵則經常藉由描述不同類別的他者以表彰個人生命，包括親近／重要他者、理想化但不在場他者、歷史／隨遇他者和主體他者等。敘事記憶經由個人在社群網站中的社交圈分享、傳播，其實際閱聽人則可能透過網站功能，給予即時（或非即時）的回饋，其回饋亦可循此為敘事者所接收。如前所提，個人可能因諸多因素調整記憶篩選和組織方式，那麼，本文所欲再行探問的是，前行敘事記憶的生產、分享和回饋接收經驗，如何影響後繼敘事記憶的歷程；亦即，當下的敘事記憶的生產、分享和回饋接收，如何可能鑲嵌（*embedded*）於前行經驗之中？而這些「微型敘事記憶」（仿前引「日常生活的微型紀錄」）又是否可能以連續或間斷、系列或非系列性形式，依時序跳躍、串接，構成自我記憶的環節？

綜合以上所述多重他者在個別記憶敘事中的交互作用模式、以及前行與後繼敘事記憶經驗之間的影響、鑲嵌關係，本文擬出理論模型如圖 1。圖中灰底波浪色塊代表個別敘事記憶經驗，依發生先後排序、串

連，構成一連續體；色塊波浪形體不一，意指個別敘事經驗有異；上下色塊曲線貼合，象徵前行與後繼經驗的影響／鑲嵌關係，其顏色依序加深，意味前行經驗的影響逐次累積。如圖所示，前行經驗中的多重他者與後繼經驗中者可能不同，但兩造之間仍因經驗之間的影响／鑲嵌關係有所關連；做為整體敘事記憶經驗的一環，前行實際閱聽人的回饋則可能以迂迴的方式，進入後繼敘事記憶的生產、分享和回饋的過程之中。

圖 1：多重他者在社群網站敘事記憶中的影響模式



資料來源：本理論模型為研究者自行整理。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根據以上理論模型，本文在下一節中進一步闡述研究問題並提出相對應的研究方法，以茲探求本文研究題旨。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四個親子記憶的個案為基礎進行多重個案研究。如 Conway & Williams (2008) 所言，親職是自傳式記憶的一大生命題旨，兒女的成長階段也可能成為個人生命時期分段的界線。同時，孩子經常是生命中的親近／重要他者，表徵親子共享生活歷程的情節式記憶，對於自我身分和自我價值意義重大。親職角色則受社會規範約束，社會課責面向顯著，有助於深入討論本文欲探究的問題。個案研究常被援用以深入了解發生於真實情境中的當下現象，可茲解釋理論觀點和描述社會事物；具代表性的個別案例之研究結果，有助人們理解類似案例；多重個案則可廣納現象、分析比較 (Stake, 2000, pp. 22-24)。本文所選取的四件個案由本文作者透過個人社會網絡招募，每件個案均長期或在某一段時期在臉書個人檔案中密集張貼以孩子成長或親子共享時光為主題的圖文，在彰顯前揭各種他者介入層面上同中有異，強弱程度亦有所別，可資綜合比較、探索本文題旨。

為探究多重他者如何在臉書上特有的社會互動環境中出浮現，並且或多或少左右敘事者在篩選、排除、組織和詮釋日常生活記憶上的方式，個案研究依據以上所提之理論模型，聚焦於一系列問題如下：

1. 親子生活中的他人，尤其是親近／重要他者，如何以顯著或隱晦的方式進入敘事記憶的文本？敘事中呈現的自我，所隱含的主體他者為何？
2. 誘發個案親子貼文者為何？個案慣常設定的說話對象為何？個案

如何想像其貼文的閱聽人，如何與回應貼文的閱聽人互動？

3. 做為敘事記憶和社會互動的場址，臉書個人檔案的功能如何影響上述多重他者的存在方式和作用？
4. 角色典範、社會規範、臉書的集體慣習和文化腳本，如何介入個案親子敘事記憶的個人腳本？敘事文本的誘話者、說話對象和想像閱聽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5. 敘事者如何接收、看待他者回饋，包括是否回應以及回應的方式和內容（如留言、按讚）？對於他者回饋的接收和看待方式，是否且如何影響個人日後書敘事記憶的生產和分享？例如依前行經驗調整未來發文和敘事策略，或者修飾、修改、甚至移除當下敘事內容？

個案研究的方法可包含直接或參與觀察、訪談、檔案或物件研究等（Yin, 2012, pp. 4-11），本文則以長期觀察個案臉書檔案和個別深度訪談為方法。每件個案的臉書貼文及其回應互動皆經過歷時一年以上的密集觀察，時間主要集中在 2015 年至 2016 年。2016 年七月和八月間，另各自進行一到二次的深度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二至三小時。訪談以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問題方向圍繞本文研究主旨，但依個案臉書內容以及訪談時的話語脈絡而調整。顧及隱私，受訪者的帳號名稱以化名取代，貼文和照片內容主要以描述方式引述，訪談內容則依撰文脈絡，以直接引述和間接引述如實呈現。觀察臉書發文及互動的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其敘事記憶的常模，尤其是題材取向、敘說模式和回應留言的慣習，同時搜集吻合研究問題方向的樣本。訪談則用以了解常模發生的原因、個別樣本的生產脈絡，以及受訪者如何看待和安置這些敘事記憶，訪談問題包含以下面向：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1. 受訪者臉書的使用習慣和發文原則。
2. 受訪者的親職經驗和心情體會。
3. 對於個人生命處境和角色規範的看法。
4. 發布特定貼文的脈絡、動機，以及對於發布該圖文的想法。
5. 是否編輯自己的貼文，原因為何？
6. 是否回顧自己的貼文，原因為何？
7. 是否預設貼文的閱讀者和回應者？
8. 如何看待及應對臉書朋友的回應？

本文研究在方便取樣的範疇內選擇具代表性的個案，並以文獻理論為基礎設定問題意識和分析框架，再行資料採集和分析。出於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發現限於現象發生可能性及其文化模式之探索，無法概說現象之普遍性，尤其樣本來自個人社會網絡，在社經階層、族群團體和年齡層上亦有所限，在此特別說明。

肆、個案分析

一、個案一：ST

ST 在受訪時四十一歲，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及專業接案工作者。妻子是企業經理人，工作忙碌。兩人育有兩個學齡前的兒子。ST 擅長廚藝，喜歡為全家人精心煮食，尤其是父母或岳家假日共享的盛宴，餐後並包辦洗碗和廚房清潔。除了煮菜，ST 擔負兩個小孩的主要照顧工作，包括接送上學、洗澡、說故事、哄上床和生活陪伴。

在觀察期間，ST 的臉書平均每週中出現一至兩則以廚房餐桌或奶爸家常為主題的圖文；這兩類貼文是 ST 臉書的主角，兒子則是最常描

述的重要他者。廚房記事通常包含至少一張費心擺盤的餐點獨照以及小孩坐在桌前準備大塊朵頤的照片，文字敘述餐點為誰而做（多半是奉小孩旨意）、餐點做法及用餐者歡愉用餐的心情，有時附帶自己在餵飽小孩（或老婆、長輩）後的滿足感受。奶爸記事也一律照片配短文，偶爾搭配短影音，主題包括陪小孩玩玩具、為孩子洗澡、讀書說故事、唱歌給孩子聽、陪伴他們上床，以及歡慶重要成長階段（如生日、學步、上學）等。通常，ST 會在做完晚飯後到陽台抽根煙，再回到餐桌前為餐點和用餐的孩子拍照存檔，隨後進行家務育兒瑣事和白日無法完成的工作。臉書上看來輕鬆適意的生活速寫圖文，經常是他在深夜人靜或週末偷閒時調出照片、重溫先前時光並梳理記憶後書寫張貼的。

ST 自高中時代起開始書寫並保存紙本日記，接受訪談時已累積數十本日記。初始動機是「萬一老了忘記以前發生的事，可以拿出來看看」，寫了三、四本之後回頭看覺得好玩，便一路保持至今，並且每寫完一本之後隨意抽取一本閱讀，以審視自己的心境變化。網路傳播發達後，他也開始寫部落格、使用 My Space 建立自己的網路空間，接觸臉書後，前述兩者便逐漸棄用，然而，紙本日記書寫習慣始終維持不變。因為臉書不若紙本容易翻閱回溯，加上發文量大，ST 沒有回顧臉書舊文的習慣，若有認為值得特別保存的記憶（例如如何替新生兒洗澡），另外以電腦資料夾存檔。

就 ST 而言，寫日記和寫臉書是完全兩件事。他認為，日記是用來記述日常流水帳和不便告知他人之事，例如批評社會和討厭的人與事，這種個人瑣事和私人情緒，尤其是罵人的話，自己知道就好，免得傷人；相較之下，臉書是用來寫給別人看的。他的臉書貼文隱私設定只分兩種：朋友和公開，涉及家庭生活的貼文一律僅限朋友觀看。他認為隱私功能細分太費事，「大家通常不會分那麼多」，所以只選擇可以放心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的對象加友，目前帳號上 800 多個朋友大致符合這項原則。

ST 說一開始貼廚房記事是分享做菜心得，但自從在親職中得到快樂之後，發文的首要動機是讓關心他現況的人知道他其實過得很好，其次是分享他的另類成就。他在訪談中自言，早先，對於未能順利覓得專任教職一事感到不平，也承受來自長輩關切的壓力，但是孩子出生之後想法改變，認為只要生活過得去，父母和岳家都能接受，他很樂意維持現在生活模式，甚至當個全職奶爸也很好：

我喜歡帶小孩和持家，如果我太太薪水是現在兩倍，我會專心帶小孩，開課當樂趣，我爸媽看我這樣他們也很開心（略）……我覺得是另類成就吧，比較多的時候是讓我的好友知道我過得很好，他們會很開心。

他很清楚當前社會的男女角色設定，也明白外界異樣眼光存在的可能，但他表示不值得在意：

你不是我啊！你不知道當奶爸的樂趣，How can you judge me?我會很大聲：你會煮飯嗎？你會幫小孩換尿布嗎？

因為自詡照顧教養成功，ST 不吝惜在貼文稱讚孩子、表揚自己（例如說孩子經他「細心照料，果然長得很好」，或者讚許自己的料理，讓「老的小的都開心」）。此外，他也經常在臉書上直陳父愛，例如，在貼文中說自己的烹飪比起名店「或許檔次還不夠，但這充滿○○○對家人的愛」。出於奶爸自豪，他說他也寫給「有小孩的人」看，提供養育心得「做功德」：

我覺得我養得很開心，大家姑且參考一下。幫助別人也是功德一件，因為很多人帶小孩帶到崩潰（略）……我想說的是，不管多忙，我都好好回家煮飯，兒子吃得很開心，我想傳

播的是，跟孩子在一起是一件很美好的事（略）……我在談論這些的確有選擇性，我選朋友，讓他們看到我和孩子的互動，是一種正面的力量。

然而，ST 的親職經驗並不乏困難與挫敗。他說，他會找書或其它育兒專業資訊尋求解決之道，不會到臉書上求援或抱怨，因為呈現負面的情緒或處境（尤其是親職），違反了他的臉書發文原則。觀察期間，ST 只有一次提到孩子不想早睡讓他很困擾，偶爾出現的負面訊息多半來自工作中遇到的人事物。

雖然他用「pathetic（可悲）」形容發文沒人按讚就感到失落的人，並且說，「你看不看是你家事，我（發文）就覺很爽啊」，不過，對於臉書朋友的反應，他仍是在意的。發文後他一定會去看有無或多少人「按讚」，心裡自知他的育兒文也算一種炫耀文，希望得到贊同。事實上，在研究觀察期間，他的親職圖文通常在發文後得到至少幾十個讚數，每篇都會有人留言回應，大多是讚美話語，或者進一步詢問菜色。ST 則經常就個別朋友的留言提出回應，若是提問，他通常不論親疏、詳細答覆。

ST 自陳的兩種發文動機，顯示兩類預設說話對象，兩者不盡相同但可能重疊。一種是生命中較重要的他者（關心他的人，包括家人和熟識的朋友），一種是同具親職身分者（其中包含熟識朋友）。從回應數量和回應內容觀察得之，ST 親職貼文的實際閱聽人並不限於上述兩類預設說話對象，例如，他的學生即經常予以留言回應；這類閱聽人的存在也在 ST 的想像之列，其正面回應（例如按讚）也具有鼓勵作用。訪談和線上觀察顯示，預設說話對象和想像閱聽人的存在以及實際閱聽人的正面回饋，在不同程度上誘使 ST 持續在臉書上分享育兒生活的記憶；然而，從最初的動機來看，這一系列記憶敘事的主要誘話者，是與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傳統男性典範抗衡的 ST。

儘管在受訪當時，ST 認為自己已能從親職中肯認自我成就和價值，但是未能覓得專任教職一事仍是生命中的挫敗和必須面對的問題。長輩們「何時找個正職」的垂詢，暗示著他未能達成傳統男性典範的指標（「立業」和經濟穩定）；面對這種處境，他在新典範（愛家奶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倘若每個自我敘事中皆隱含一個主體他者，在此，正是 ST 賴以建構自我身分的新典範男性圖像。

做為一個協商、抗衡的敘事主體，ST 在預期正面回應的假設下，以固定腳本頻繁發文，行禮如儀般反覆述說同一種故事（用心做菜帶孩子）。這些反覆述說的故事，一方面積累個人生命史，同時，也是一種藉由敘事記憶調解生命處境的生活儀式。他所預設對話和聆聽的他者，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新舊典範代理人的角色：其中，有著 ST 想說服的舊典範遵循者（包括擔心他無專職的人），也包含了能夠贊同他的當下成就、多少認同新典範觀點的人。按讚或正面回應 ST 的閱聽人，則在此儀式操演中扮演協力誘話者的角色，鼓舞他持續進行日常微型敘事記憶的工作、直接與社會價值對話，證明自己的當下生命符合社會課責的準則，可以大家一個交代。

二、個案二：HH

HH 在受訪時四十八歲，國內大學畢業並留學歐洲取得碩士學位，婚後長住留學國，兼職翻譯工作，與歐裔丈夫育有一子，小孩就讀小學高年級。和兒子日常互動的光景，是她臉書貼文最主要的題旨。因為擅長文學性書寫，HH 的親子時光多半被轉化為趣味且情節豐富的散文、童話或短篇故事，小孩的名字也隨故事情境更換暱稱；有時 HH 會採取

虛構敘事的風格述說真實發生的事，或是在真實事件後加上一些奇想情節。這些故事歷歷如繪再現了親子之間的對話，尤其是孩子拌嘴時的聰慧言語，或者孩子的夢境、學校生活插曲，或者親子出遊，或生病臥床等。HH 不常張貼孩子的照片，偶一為之，多半因為主題和孩子的模樣有關（例如堅持把頭髮抓成某種造型才願意出門，或連續三日穿某件衣服不願更換等）。除了兒子，丈夫是另一個會出現在文中的重要他者，經常被描述為 HH 的對照組，彰顯爸媽或臺歐模式的差異。

雖然外語流利，但 HH 覺得以母語表意最完整，希望和孩子之間有最深刻的互動，堅持讓孩子學中文。她的臉書朋友大都為中文使用者，絕大多數的親子圖文也以中文寫作，有時附上外語翻譯；純外語貼文很少，以少數外國親人和朋友為對象，多半會附上中譯讓臺灣朋友了解。

由於在家兼職，除了丈夫，她生活最常接觸的人是孩子，此一階段的個人生命史，是和養育孩子綑綁在一起的。HH 覺得，孩子是她目前最好的朋友，記住與孩子共度的時光是非常重要的事，希望能「像拍照一樣」留下鮮明記憶。雖然不會特意地回顧臉書動態，但臉書自動提示熱門貼文和「我的這一天」等功能，常令她不經意回溯過往之餘，慶幸當時留下紀錄。除卻不想遺忘，HH 希望這些記憶將來可以分享給長大以後的兒子。至於未來孩子是否果真能與她共享，HH 並不執著，「那是我的歷史，……對於小孩來說，那就是你的遺物，看他要怎麼處理」。因為把臉書當成組織和保存記憶的媒介，以未來的自己和孩子為預設閱聽人，HH 說她在記述時希望儘量真實：

我自己儘量做到誠實。……當有機緣回去看到自己寫的，就會覺得我現在寫（臉書），儘量純真，保持這個樣子，然後過幾年我再來看的時候，我看到的是真的，而不是為了讓別人而做假。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由於年幼且中文閱讀能力有限，孩子迄今尚未成為她的讀者，目前的臉書朋友才是實際閱聽人。HH 喜愛寫作，自小學六年級起開始寫日記，但並非每日書寫，大學之後開始使用電腦打字，逐漸放棄紙筆書寫，寫日記的習慣也中斷。網路社群興起，HH 陸續加入論壇、部落格、噗浪和臉書使用者行列，慣用臉書後，部落格和噗浪停止更新，若干原發佈於部落格的文字和照片，則被轉貼到臉書。HH 說，開始使用網路寫作後，習慣有讀者，無法像過去寫日記一樣，只寫給自己看。這種習慣上的改變，與網路可即時、遠距、一人對多人的社會互動機制有很大的關係。她說，網路朋友的回應讓她「覺得很好玩」，尤其臉書常固定有人回應，令她更有動力持續這項習慣：

我在 Social Media 寫東西時，心裡設定有讀者，而且是有特定讀者。我的動力是寫給別人看的，那個心態和寫日記不一樣了。自從這種新的溝通科技出現之後，人的心比較浮動，希望有立即回饋。

我會注意多久時間有人回應或按讚。現在的人有刷存在感的需要，從前的人可能也有這種需要，但沒這麼被張揚。……這種刷存在感是很大的動力。

HH 網路書寫經驗豐富，但臉書朋友僅百餘人，貼文一律給所有朋友觀看，不再另行分類隱私。HH 認為無此必要，因為「會按讚的只有那幾個」。換言之，HH 對於自己閱聽人的想像，多以前行互動經驗為基礎，撰文內容可依目標閱聽人而異，發文則以抽象閱聽人為接收對象。或因隱私設定寬鬆，HH 在負面記憶的揭露上，採取一定程度的隱晦敘事。雖然深受西方自由精神薰陶，在日常教養中仍難免與孩子有所衝突、甚至發生體罰或其它事後感到懊悔向孩子道歉的事。她說自己並

不避諱在臉書上分享這類記憶，因為那是生命真實的面向，但是這類的作為，違背了她所受的社會期許，因而選擇特意修飾文字：

體罰不好啊，但有時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我有時候會寫「把手舉高」。我是覺得這是比較負面的形象，寫得含蓄別人看可能看不懂，但我自己會知道。這也是我的一部份，我會這樣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儘管追求本真自然，HH 自言始終難脫臺灣傳統好學生、好孩子的框架。她說，如果不是受限於此，她也不會乖乖讀書，滿足家庭和社會期望。相較於臉書中的自我審查，她在日記裡並不特意修飾，也不避開隱私。不過，原先書寫日記的習慣已經被網路社群記事取代，不便披露的事，因而也無從以文字紀錄。她認為，許多事「如果沒有記錄說不定就忘了，忘了就算了，反正忘記的事太多了」，負面的事「不寫就算了，就被遺忘在時間的長河裡」。

整體而言，誘發 HH 親職敘事記憶的，是追尋生命存在感受、並且亟望與人共享其歷程的自我；其說話對象除了未來的自己，尚有那在可望但不確定的未來、能夠回應其生命情調和歷史的孩子。想像閱聽人的存在以及實際閱聽人的回應，是支持她以臉書做為敘事工具的重要驅力，扮演了協力誘話者的角色。雖然追求本真，但 HH 心中的社會框架促使她自覺閱聽他者的存在之下，進行隱晦的自我審查，選擇性地遺漏和調整自己經由社群網站所再現的自傳式記憶。在此延續性的自我敘事文本中，與「敘事中呈現的我」相對映的主體他者，是一個純真書寫者和傳統好孩子的混合體。值得一提的是，HH 的部落格文字，近兩年因為自覺遇到瓶頸，無法靜心落筆，臉書成了方便的替代品，讓她可以「寫短文刷存在」，也藉此保全了自己珍視的生活記憶。在以臉書做為現階段唯一文字敘事記憶載具的狀態下，HH 必須在誘話者、說話對象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和活躍閱聽人之間尋求平衡，經營她所欲保存的照相般的記憶。

三、個案三：WL

WL 在受訪時四十九歲，國立大學畢業，事業有成，與社經地位皆高的丈夫育有二子，兩子均就讀國內頂尖大學，大兒子剛自大學畢業。約在受訪前兩年，她開始大量張貼有關孩子的照片和文字。當時，兒子都已是大男孩，一個讀大學，一個讀高中，但兄弟倆的日常生活圖景，仍是她臉書故事中的主角。包括兄弟倆在床上熟睡的樣子、被媽媽打針時愁眉苦臉的表情、準備面試前整裝出發的身影，以及母子共享盛宴、出遊和居家活動等日常相處時光，經常以快照的方式記錄張貼於 WL 的臉書，並輔以輕快簡短的文字描述影像中的故事。大量張貼這類圖文，除了因為喜歡分享，主要動機是害怕遺忘：

因為覺得他們成長得很快，想留下吉光片羽的東西。最早是當成一個紀錄，我怕忘記。人生記憶會慢慢淡掉。

這種心情，在小兒子剛上大學時更為強烈，「覺得當媽媽的義務已盡了大部份」，因為上了大學就是成人。為此，她在臉書留下一篇長文，回溯孩子一路成長中困難和彼此扶持的重要歷程：

我那時也是有感而發，就突然發覺孩子都長大，兩個孩子都長大了，那幾天我就一直在回憶，就自然而然回憶他們從小到大的樣子。…就算是用心吧，…我覺得當媽媽就是要這樣子，不管對或不對。反正我就很努力的試試看，我自己就覺得蠻動人，就感動自己啦。然後看到他們長大了，覺得一下子就過去的感覺，想把它記下來，在我印象還很深刻的時候。

WL 明白，這些貼文和照片所記錄的，不只孩子的成長紀要，尚且是自己的生命軌跡，臉書上的這些親子圖文，其實是她自我母職的記憶工程。她說，孩子都已經是大人或半個大人了，還會「配合演出」，讓媽媽拍這麼多照片，是因為「他們知道那是媽媽的生活，就（讓媽媽）留下那個照片」，WL 認為，那是孩子照顧她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心靈上是他們在照顧我，……老大思想成熟，他國中時陪我渡過一段低盪的時間，他會陪我聊很晚，我會談我心路歷程。

WL 所說的低潮時期，來自事業上的挫敗，當時，她無法原諒失敗的自己，因為，這與她的自我期待嚴重相違。WL 擁有令外人欣羨的人生，但內在經常自我鞭笞，這一點與母親的期待有很大的關聯。在 WL 眼中，母親是一個非常優秀、令她仰望的對象；相對地，母親對她的期許和訓練也不比尋常，少時是學業和才藝，成年後則是工作、婚姻和家庭。為了完成母親的期待，WL 經常壓抑自我欲望與情感，以符合模範生的框架，即使母親早逝，WL 仍隱隱背負著想像中的眼光和期待，深怕出錯（「即使媽媽不在了，我的那個自我譴責能力很強」）。在這種情況下，WL 認為自己沒有童年，也沒有青春叛逆，甚至對於自我壓抑一事渾然不覺，一直至三十幾歲，她開始有所覺醒。直至今日，她還在努力與這種壓力進行對抗，而這種心境，也左右了她教養孩子的方式：

等我了解自己（的問題）之後，就覺得我養孩子一定不要這樣……我一直在衝突，但還是讓自己放手。……我沒有嚴格管制，他們不需要叛逆。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全然自由的過程，所以我很羨慕。他們有，但我沒有，我也很 appreciate 我自己，可以給出他們有、但我沒有的東西。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WL 習慣回頭細讀自己的臉書貼文，審視書寫當下紀錄的事物和心情。除了紀錄，WL 也希望自己的記憶和情感被看見。因為交友廣闊，擔心私人生活暴露在不甚熟知的人面前，WL 依親疏或按讚／回應頻率，區分「朋友」和「點頭之交」，涉及個人和家庭生活者（如親子貼文）只限朋友觀看，「會覺得這些人是我的觀眾嘛，是我的朋友，他們會比較了解我的生活」。在此，經常回應互動的實際閱聽人是 WL 所設定的想像閱聽人（「觀眾」），也是她認為會聆聽自己的說話對象（「了解我」）。面對這些經過篩選的閱聽人／說話對象，WL 仍避免發出負面訊息，一方面是性情使然，另一方面是因為對於臉書文化的認知：她說，依她所見，臉書上大都「很 happy」，「拼命奮力工作的東西誰要看」，溫馨家庭生活或小孩貼文最受歡迎，自己寫小孩的文字得到的按讚次數也特別多。也因此，即使臉書朋友們常給她正面回應，但失意挫敗或掙扎矛盾的記憶，並不在她的分享之列：

我非常喜歡分享，但要在一個安全範圍內。……臉書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地方，我自己就不會把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寫在上面。……如果熟的人，我會直接講。我不習慣把自己弱的地方展現出來，他們也未必能理解，而且把它講出來有什麼好處呢？人會希望有幾個懂自己的人，我覺得那些不夠了解我的人去懂這塊，不太安全。

面對生命中的負面向度，WL 選擇先「擺在心裡」，然後與熟友口語對話來處理自己的心情（「會從對話中重新看到自己」）；相對之下，在一群無法掌握安全性的臉書朋友前揭露負面的自我，並非理想選項。事實上，除了親職敘事，WL 的臉書圖文，不限題旨，恆常呈現完美圖像，包括休閒、運動、連誼、出遊等皆然。她自言，不管做什麼都想做到最好，即時玩都要玩得很認真。多年下來，覺得累了「想偷懶，

不想再那麼優秀」，但內心又經常不允許自己如此。做為 WL 生命歷程的關鍵人物，母親是她臉書敘事中的主體他者：完美又嚴格的母親所樹立之典範形象，是 WL 協商的對象（渴望自由、不想延續她的教養方式），但也仍是不由自主依循的對象（凡事做到最好）。誘發她書寫紀錄生命的，除了那不想遺忘努力痕跡的自己，尚有那與主體他者協商的自我。而臉書近友在扮演想像閱聽人和說話對象之際，一方面聆聽著期望從完美形象中解脫、卻不免時時自我檢查的自我，一方面也接替過往母親的位置，審視、回應自己的表現；至於孩子，雖是敘事所描述的重要他者，卻非 WL 預設讀者和說話對象。相較於 ST 和 HH，WL 對於臉書場址文化的自覺性較強，在分享記憶之餘，也謹慎排除過多負面或內在衝突的訊息。例如，WL 曾在臉書上數次提及兒子陪伴沒有童年生活的她一起玩耍，但卻不直言當年母親的嚴格管教，即為一例。

四、個案四：CM

CM 受訪時 30 歲，國立大學碩士畢業，兒子尚未進入幼稚園，除兼職企劃外，全心照顧獨子。她的臉書親子文以兒子的照片為主，說明照片的文字多半很短，有時只有一兩行。這些照片通常構圖和光影都很美，以孩子的表情或姿態為圖像主體，有時 CM 也會入鏡。照片經常出自攝影行家丈夫之手，非常賞心悅目。照片和文字捕捉了許多燦爛時光：兒子苦著臉剪髮的時刻、在海邊奔跑的背影、抱住 CM 的剎那、笑容可掬爬行的瞬間等。

雖然照片不見得由 CM 親手拍攝，但照片和文字的組合，皆是在她費心編排下完成。CM 自言，她的臉書貼文有一定的策略，建立這些策略的基礎，來自長期觀察其它年輕媽媽的臉書，尤其是熱門的親子粉絲專頁。CM 說，根據她的觀察，炫耀性的圖文確實可能令人生羨、受到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追隨和正面關注，但不能過度誇大（「很假」、「騙人」），不然會受到追蹤者的唾棄。CM 也認為，有些媽媽一天到晚張貼小孩照片，但照片並不很可愛，自己千萬不可效法。因此，她一定會先確定孩子的照片夠可愛、夠吸引人，才會張貼，文字也會先打腹稿，「不曉得為什麼要給自己壓力這麼大，可是就是下意識會這麼做」。

即令照片可愛，CM 仍然會壓抑自己在臉書張貼親子文的欲望，免得自己無意中一直「洗版」別人的臉書。平均每週一到兩次，她會刪除已經動筆但尚未發出的貼文：

雖然現在只剩小孩的事，因為很多同學還沒結婚，我怕我的臉書成為育兒臉書，有時寫完就會把它刪掉，覺得「唉，我真是一個媽媽耶」。我不想造成大家的負擔，覺得「天啊都是小孩子」。我覺得要有節制。

對於已發出的文字，她經常回頭審視，尤其是讚數較高的貼文，但傾向避免多次修改，以致讓人覺得自己太刻意維持形象：

有時候自己寫了一篇，很多人按讚，還會回去反覆推敲那個字，用得好不好，會回去修修。但我很少這樣，因為編輯的紀錄別人看得到，……我會儘量減少編輯的次數。所以一定要當心，步步為營。

CM 另一個觀察是，抱怨性的文字多了會令人不耐，尤其言過其實者，更令人「翻白眼」；為了維持禮貌關係，她會勉強自己偶爾正面回應這類文字，但內心會告誡自己不要像她一樣。事實上，CM 曾有過一次難忘的經驗，讓她對於發布負面訊息的文字更加謹慎。她曾在深夜發了一則抱怨獨自帶孩子太苦的短文，發現半小時後都沒有任何回應，「覺得太丟臉了」，隨即予以刪除：

我還記得那時候 po 了半小時都沒有人按讚。……臉書上隨時都會有人醒著啊，……我覺得太丟臉了，就把它刪掉。從此我就告誡自己不行，以後要多把我的光明面放在臉書上。所以我現在很少更新，因為當媽媽壓力很大，有時候想要發洩，我就會忍住不要放在臉書上。因為 po 了就會讓人家覺得，我就是當媽媽過得很不好啊。我就會忍住，開心的時候才會去更新它。

也因而，儘管育兒過程中經常有無法承受的時刻，她也不願訴諸臉書。例如，受訪前幾個月，CM 才因為孩子深夜玩鬧而情緒決堤，這種情節，她就不想在臉書揭露。除卻希望得到真誠與正面的回應，CM 希望自己的自我形象，能夠多少吻合她私心稱羨的當代年輕母親典範。她以某位網紅媽媽為例，說明心中的典範：

必需產後身材恢復，漂漂亮亮，老公愛，小孩可愛，如果沒做到這點就把自己露出來，就沒有人要理你。

典範壓力之外，CM 對於擔任全職媽媽一事內心一直有所掙扎。CM 從前認為當全職家庭主婦「生產值很低」，後來學著先肯定自己，好讓別人看得起，所以「努力營造一個正面的家庭主婦形象，覺得當家庭主婦也沒那麼差」，讓臉書上的自我「充滿正面能量」，至於負面情感和自我檢討的文字留在日記本裡就好。

對於臉書文化、典範形象和他人評價的高度自覺，令 CM 的親子敘事展演了現階段的理想自我，同時也保全了生活中的完美記憶。在這些記憶再現中，CM 享有快樂、幸福、育兒有成的生活。對於 CM 而言，儘管這些記憶再現乃經由嚴格自我審查下特意篩選而得，卻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也就是，幫助她撐過日常育兒工作中辛苦難挨的時刻：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我）可能 po 張小孩很可愛（的照片），看誰回我，看讚越飄越高，然後把手機關了，繼續回去煮飯。煮完小孩又鬧了，安撫他，然後就回去看臉書上那個很光明的自己，看得到幾個讚。

在這種心情下，她非常在意按讚的次數，希望大家都喜歡照片狀態下的兒子，如果按讚的人數很高，會覺得當媽媽的她也受到肯定，「因為這個狀態是我賦予他的，因為我很努力，所以才會有快樂可愛的他」。她說，她一定要努力記住這些美好時光，告訴自己一切是值得的，好化解現下生活壓力，尋得正面能量。臉書加上手機的快速紀錄、回應和觀看的功能，促使 CM 可以隨時調出這些經過精心篩選、美好愉悅、並且得到他人肯認的記憶再現，一則刷新記憶，另一則鞏固建立在此記憶上的自我身分。

綜合以上，CM 的臉書親子圖文保全、形塑生命中理想時刻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需要受到他人認可，並且在受到認可之際，支持 CM 期許的自我實現。換言之，最終誘發 CM 臉書親職敘事的，是極力渴望肯定現階段生命價值的自我。她的困頓與掙扎來自高學歷專事母職的身分，與自第二波女性主義以降、經濟獨立且參與社會的女性典範相違；在選擇全日母職的條件下，她以另外一種當代年輕母親典範（時尚亮麗、小孩可愛、不抱怨）做為主體他者。網紅臉書的發文模式和策略，以及他人臉書的瀏覽經驗，則是她假想閱聽人喜好和說話對象價值觀的依據。CM 並不在臉書朋友中設定觀看權限，雖以所有臉書朋友為預期中的閱聽人，並非所有人的回應（與不回應）對她而言，都是等值的。例如，「長輩」朋友雖然也可能是實際閱聽人，但是他們的回應，多半受到禮貌式應對，CM 並不放在心上。她真正的說話對象是同儕女性，只有對於她們評價的想像以及她們的具體回應本身，才會影響當下和後

續的敘事行動。做為說話對象，同儕女性也扮演了新女性典範的代理人，審視並間接涉入 CM 建構臉書自我和親子記憶的進程。

伍、結論

本文從虛擬記憶鞋盒的概念和社群網站的分享文化出發，探討他者如何影響人們經由臉書進行敘事記憶的過程。根據前行研究，表徵生活經驗的情節式記憶，經常圍繞著不同生命題旨集結，共同組構個人生命故事並定義自我身分。這些記憶，可能經由日常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述說或自我敘事文類（如日記、手札或自傳等）進行組織。每一次的敘說，都是再一次組織的過程，而記憶的內涵則可能依據當下情境、意圖、心理狀態和社會互動方式，受到篩選、修飾和詮釋；社會規範、角色和文化脈絡，可能指引記憶敘事內涵，而敘事互動場址的特質和文化慣例，則可能影響敘事的策略或框架。在此過程，他人的存在、觀看、聆聽和回應，均可能涉入其中。根據自我敘事和社群網站研究，介入社群網站敘事記憶的他者可能顯現於敘事文本之內（包括重要他者和主體他者等），亦存於文本之外（包括誘話者、說話對象、想像閱聽人、實際閱聽人等）。據此，本文以四個臉書個案研究為徑，聚焦多重他者所扮演的角色，以探索社群網站在提供個人記憶銘刻的場址和傳播互動媒介之際，如何因其殊異性左右記憶生產的過程及實質內涵。

四個個案中的敘事主體，皆以孩子做為建立自我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重要他者。婚姻伴侶雖也是重要他者，但在這些以親子生活為主旨的敘事記憶中，顯少或以配角方式出現（例如 HH 的法國丈夫）。這些敘事行動之中，皆隱含賴以建構「敘事再現的我」之主體他者（新男性典範、純真書寫的好孩子、完美母親、時尚年輕母親）。歷史他者、隨遇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他者和理想化但不在場的他者，在這些個案的敘事文本中則付諸闕如。臉書的使用環境鼓勵人們快速發佈、瀏覽短小敘事，不似傳統文類方便發展繁複敘事，或因如此，個案中的故事大抵簡潔明確集中於主旨核心的重要他者身上。在敘事策略上，臉書的傳播場址特質和盛行的文化腳本，亦在不同的面向上影響四個個案的敘事腳本。ST 和 HH 順應臉書場址的功能導向，前者運用動態時報流水帳特性建立例行儀式腳本，後者發展短小精巧的系列故事。WL 和 CM 在敘事時以臉書流行腳本為借鏡，前者參考常有的快樂家庭圖像，後者則追隨網紅母親的母職腳本。

四個敘事記憶案例中，原初且最主要的動機，皆來自於內在的某種欲望；也就是，誘話者不是他人，而是敘事者本身（不想遺忘、想要分享或希望受到理解和肯定的自己）。至於正面回應其敘事記憶的閱聽人（尤其是說話對象）則多少扮演協力誘話者的角色，鼓勵個案在「心中有讀者」的狀態下，持續在此進行日常記憶的微型敘事。這些個案也顯示，說話對象是最可能影響敘事內容者，其次才是想像閱聽人。當實際閱聽人也正是說話對象時，其回饋行動（正面／負面回應），可能影響後繼續敘事行動的意願以及其內容走向；反之，可能不見太大影響力。也就是，只有被安放在某種聆聽位置、或扮演某種社會課責代理人的閱聽他者，才可能真正介入當下或後續敘事記憶的內涵；他們所表徵的，往往是受訪者在意的社會觀點或行為典範，其認可與否，也可能決定受訪者自認可分享的記憶範疇。

雖然對於外部他者的存在均有所察覺，但四位受訪者因應他者凝視的自我審查程度卻有所異：程度最小的是 ST，儘管在內容上與日記劃分，臉書發文亦有說話對象和想像閱聽人，但沒有因應他人回應改變發文儀式和內容的習慣；HH「寫短文刷存在」之餘，依假想閱聽人評價局部修飾記憶敘事的內容；WL 根據對於臉書文化特質的既有認知（報

喜不報憂），局部排除記憶中的負面訊息；CM 對於臉書場址特質和同儕文化的警覺性最高、自我審查最嚴格，以他人臉書為仿效或警惕對象，排除負面事件或情感的記錄。這些個案也顯示，對於他者凝視的覺察以及依此篩選記憶敘事的自我審查行動，與自我凝視相互連結。ST 沒有回顧臉書的習慣；HH 以未來的自己為讀者，雖不特意回溯，但喜歡利用臉書的記憶提醒功能回顧舊文；WL 和 CM 經常回溯自己的貼文，前者乃藉以自我反思，後者則為撫慰情感和審視形象，回顧之外尚且修飾。若依強弱排序，四位敘事者自我凝視程度由強至弱為 CM、WL、HH、ST，此一序位，與四人在自我審查強弱光譜上的位置相符；同時，WL 和 CM 也是較依受人肯認的臉書文化腳本調整敘事策略者。

整體而言，這些個案彰顯他者凝視和自我凝視反覆交疊的可能。他者凝視固然是傳統自我敘事文類中的一環，然而，社群網站的互動和回饋接收機制以及場址文化的可觀察性，令他者凝視更易受到感知，非傳統紙本敘事可及。本文中的個案皆從過往敘事記憶的歷程中，累積個人的經驗法則，包括經由接收前行發文所得到的回饋（多寡或內容）設想他人讚許和社會課責的邊界，或從回應中察覺實際閱聽人的存在並假以設定想像閱聽人等。這些經驗法則多少左右個案對於他者凝視的想像和他者回饋的預期，而這些想像和預期則可能影響了個案在此進行記憶篩選組織的方式以及發文的策略。訪談亦顯示，個案傾向將撰寫張貼臉書親子文視為連續性的行動。誠如前述理論模型所假設，當下敘事記憶的生產、分享與回饋接收，乃鑲嵌於過往敘事記憶的經驗之中；個別記憶敘事則在自我記憶建構的進程中銜接、堆疊成連續體，形成自我概念的重要環節。

如本文所示，人們可能在預期正面回饋的心情下援用社群網站進行記憶工作，並且因此影響記憶再現中的自我凝視。這種傾向可能是兩面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刃。社群網站固然擴充了個人敘事記憶的工作空間，增加與他人分享生活經驗的途徑，激勵人們以文字和影像符號紀錄生命歷程；然而，它也限制了記憶反思的層面和範圍。誠然，隱私設定功能可以擇選分享對象，但當社交圈擴大到一定程度，編輯朋友權限或依照貼文逐一設定成為不便之舉，人們可能僅在「公開」或「朋友」之間擇一；尤其，在追求讚數兼顧隱私之下，直接選擇「朋友」做為分享對象，是最簡便的選擇。當隱私設定越傾向寬鬆，想像／實際閱聽人的身分不確定性越高，人們很可能選擇自認最寬的安全範圍進行篩選和詮釋工作，終致決定最後記憶再現的內涵。

簡言之，紀錄與反思生命的欲望驅使人們表述個人生活經驗，他者的聆聽與觀看在強化表述與揭露的誘因之際，也阻撓了敘事記憶中的全面性自我揭露。不同於面對面互動，臉書社交活動中的想像和實際互動他者邊際浮動，令這種協力和拉鋸關係更形複雜。前行研究指出，臉書記事有助於保存記憶於個人腦海（Wang, Lee, & Hou, 2017）。值得追問的是，當人們在此重新組織建構關於事件或生命經驗的記憶，某些因為不夠安全、不符理想自我或社會課責的部份遭到排除時，是否也因此較易受到遺忘？又或者，因為同樣因素而受到修飾、改寫的記憶，是否可能因此成為自己日後追憶中的版本？個案 HH 的經驗顯示，社群網站的交友圈和即時互動功能驅使人們大量仰賴此一敘事空間時，有可能取代其它的敘事工具；據此，我們也可再探尋：人們藉由社群網站滿足分享記憶欲望之餘，是否也可能因此減少以面對面互動分享記憶的動力？

做為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發現及提問，有助思考現今人們大量從社群網站尋找生命出口的傾向與意涵，並提供後續相關研究再行探問的方向。本文研究出於研究題旨和個案樣本取得方便性，討論對象限於青壯年高等學歷之中產階級且具親職身分者，其社會課責程度較諸其它年齡

層或社會群體（例如青少年）或有不同，在本文所關注的課題上是否因此而異，有賴未來研究探尋。另外，不同社群網站功能設計和使用文化不盡相同（Marwick & boyd, 2011），其差異所造成的影響也可再行比較分析；尤其，網站功能日新月異，新舊更迭所產生的效果，值得繼續觀察。

參考書目

- 李宜穆（2011 年 12 月 1 日）。〈Facebook 大幅放寬發文字數上限~63206 字〉，
《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21096/BN-ARTICLE-21096>
- Bachrach, Y., Kosinski, M., Graepel, T., Kohli, P., & Stillwell, D. (2012). Personality and patterns of Facebook usage. *WebSci '12: Proceedings of the 4th Annual ACM Web Science Conference*, 24-32.
- Bartlett, F. C.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toletti, R. (2011). Memory and social media: new forms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B. M. Pirani (Ed.), *Learning from memory: body, memory and technolog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82-111).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Baym, N. K. & boyd, d. (2012). Socially mediated publicnes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6(3), 320-329.
- Burt C.D.B., Kemp S., & Conway M.A. (2003). Themes, events, and episode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Memory and Cognition*, 31, 317-325.
- Conway, M. A., & Williams, H. (2008).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John H. Byrne (Ed.), *Learning and memory: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pp. 893-906). Oxford, UK: Elsevier.
- Choi, Y. H., & Bazarova, N. N. (2015). Self-disclos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ocial media: extending the functional model to multiple social network sit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4), 480-500.
- Eakin, P. J. (1999). *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 making sel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akin, P. J. (2008). *Living autobiographically: How we create identity in narrativ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vush, R., Habermas, T., Waters, T. E., & Zaman, W. (2011). The making of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tersections of cultur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 321-345.
- Garde-Hansen, J., Hoskins, A., & Reading, A. (2009). Introduction. In J. Garde-Hansen, A. Hoskins, & A. Reading (Eds.), *Save as ... Digital Memories* (pp. 1-21).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Garde-Hansen, J. (2009). MyMemories?: personal digital archive fever and Facebook. In J. Garde-Hansen, A. Hoskins, & A. Reading (Eds.), *Save as ... Digital Memories* (pp 135-15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Habermas, T. (2012). Identity, emotion, and the social matrix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 psychoanalytic narrative view. In D. Berntsen & D. Rubin (Eds.), *Understanding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p. 33-53).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tz, B., Smock, A., & Reyes-Gastelum, D. (2015). Connected motherhood: social support for moms and moms-to-be on Facebook. *Telemedicine Journal & E-Health*, 21(5), 415-21.
- Hoskins, A. (2016). Archive me! Media, memory, uncertainty. In A. Hajek, C. Lohmeier, & C. Pentzold (Eds.), *Memory in a mediated world: Remembrance and reconstruction* (pp. 13-35).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Hoskins, A. (2018). The restless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mory and media. In A. Hoskins (Ed.),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 (pp. 1-2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acan, J. (1956/1968). *The Language of the self: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A. Wilden Tra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tt, E. (2012). Knock, knock, who's there? The imagined audien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6(3), 330-345.
- Litt, E. & Hargittai, E. (2016). The imagined audienc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Social Media + Society*, 2(1), 1-12.
- Lou, L. L. (2009). *Loneliness, friendship, and self-esteem: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of using faceboo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lbany.
- Marles, J. E. (2015). Simulating memory: a technique of memory and narrative in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9(4), 534-548.
- Marwick, A. E., &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1), 114-133.
- Mustafa, H. R., Short, M., & Fan, S. (2015). Social support exchanges in Facebook social support group.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85, 346- 351.
- Nadkarni, A., & Hofmann, S. G. (2012). Why do people use Facebook? *Personality &*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3), 243-249.
- Nelson, K. (2003). Narrative and self, myth and memory: emergence of the cultural self. In R. Fivush & C. A. Hayden (Ed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28).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Ohta, N. (2006). Introduction: harmony between principle-seeking problem-solving research. In L-G Nilsson & N. Ohta (Eds.), *Memory and societ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1-4).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Ong, W. (1975). The writer's audience is always a fiction. *PMLA*, 90(1), 9-21.
- Papacharissi, Z. (2012). Without you, I'm nothing: Performance of the self on Twi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012), 1989-2006.
- Plummer, K.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 Shotter, J. (1989).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you. In J. Shotter & K. J.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pp. 133-51). London, UK: Sage.
- van Dijck, J. (2004). Mediated memories: personal cultural memory as object of cultural analysis.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8(2), 261-277.
- van Dijck, J.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ck, J. (2013). 'You have one identity': Performing the self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5(2), 199-215.
- Wang, Q., & Conway, M. A. (2006).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elf, and culture. In L-G Nilsson & N. Ohta (Eds.), *Memory and societ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9-27).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Smith, S., & Watson, J. (2010).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ake, R. E. (2000). The case study method in social inquiry. In Roger Gomm, Martyn Hammersley, & Peter Foster (Eds), *Case study method: key issues, key texts* (pp. 19-26). London: Sage.
- Toma, C. L. (2010). *Affirming the self online: motives, benefits and costs of Facebook u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New York.
- Wang, Q. (2013). *The autobiographical self in time and cultur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Q., Lee, D., & Hou, Y. (2017). External the autobiographical self: sharing personal memories online facilitated memory retention. *Memory*, 25(6), 772-776.
- Wang, Q., & Conway, M. A. (2006).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elf, and culture. In L-G Nilsson & N. Ohta (Eds.), *Memory and societ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83-86). Hove, UK: Psychology Press.
- We Are Social & Hootsuite (2019, January 30). *Global digital report 2019*. Retrieved from We Are Social website: <https://wearesocial.com/global-digital-report-2019>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Yin, R. K. (2012). *Applications of case study research*. London: Sage.

Yang, C. C., & Brown, B. B. (2015). Online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and self-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lege transi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 402-416.

The role of ‘others’ in the self-narrative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 case study of Facebook parenting stories

Yow-Jiun Wang *

ABSTRACT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that define self-concept are often configured in self-narratives that take place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 or take the form of literary genres. Providing interactive and narrative spaces, Facebook as a social network site not only serves to elicit and inscribe memories, but also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rrators and their interactive others. Via multiple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parent-child memories, investigating how multiple others, including proximate/significant other, subject Other, coaxer, addressee, and imagined and real audience, are involved in personal narrative memories on Facebook.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nterviewees tend to fit in with the common culture of Facebook and script their posts about parent-child lives as happy short stories. The coaxers in the cases are the narrators themselves, who want to record precious memories or adapt to life situations. Against various subject Others, the interviewees construct the narrated “I”s. The feedback mechanisms of Facebook allow the interviewees to perceive audiences’

* Yow-Jiun W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yowjiun@mail.ncku.edu.tw.

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與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

responses, thus enhancing their motivations for posting and sharing memories. Playing collaborative coaxers, the audiences act as the agents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affecting the interviewees'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ir methods of selecting and organizing memories. Comparing with the usual imagined and real audiences, the addressees' perspectives and responses are more influential. Self-censorships based on others' gaze are related to self-gaze. Owing to its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nd observable cultural patterns, Facebook accommodates the interplays between others' gaze and self-gaze implicated in the continuous micro-memory narratives on the platform.

Keyword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digital memory, imagined audience, narrative memory, self-narrative, social network site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四一期 2019 年 10 月